

中国武术“德击一体”的本质论研究

李 龙

(南京体育学院 发展规划处,江苏 南京 210014)

【摘要】辩证地认识和推进中国武术发展尤其是竞技武术套路的发展,需要全面、整体地认识、把握和理解中国武术本质。因此,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法等研究方法,研讨中国武术本质,旨在为理解、认知和推动中国武术发展提供本质论理论支撑。研究认为:①中国武术技击具有多元化的显现形态,通常呈现为想象技击、相对实战技击和实战技击。竞技武术套路的“高、难、美、新”技术发展方向应该坚守并围绕代代传承下来的精巧的武术技击含义、技击神韵及武德展开。②武德是中国武术发展的伦理罗盘,对中国武术技击具有支配和规训作用。③中国武术本质是德击一体。武德和技击是中国武术本质不可分割的两面,互为其根,相互依存,互相扶持,互相成就。中国武术既不存在没有武德约束的技击,也不存在没有技击载体的武德。任何试图割裂技击和武德去谈中国武术都是一个伪命题。只有将技击和武德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才能正确地看待和理解中国武术,继而指导中国武术发展。

【关键词】武术本质;武德;想象技击;相对实战技击;实战技击;竞技武术套路

【中图分类号】G8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5656(2025)05-0131-08

DOI: 10.15877/j.cnki.nsic.20251013.002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1]中国武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中国武术的传承、发展对增强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新时代想要传承、发展好中华武术文化,首要任务是正确理解武术的本质。但学界对“武术之本质,始终徘徊在困惑犹疑的边缘,欲罢而不能,欲理而还乱”^[2]的争议困境。如“技击是武术固有的,是武术中根源性、根本性的属性,同时,技击也具有深刻性、一贯性和稳定性,只有技击才是武术的本质”^[3]“技击不是武术的唯一本质,武术本质具有层次性”^[4]“以技击作为武术的本质来界定与域外武技比较中的‘我优他劣’并不合适”^[5]“中国武术的本质属性是攻防而非技击,攻防是内在的属性,技击是外在的表现”“技击作为武术的本质无法涵盖武术功能的多元化”^[6]“立体的武术内涵包容多维,有搏击技法的表象,更有内隐、核心的塑人目标和价值,故武术

本质趋于‘以搏塑人’”^[7]等诸如此类的关于武术本质的研究文献还有很多^[8-9]。毋庸讳言,学者们基于多元视角对武术本质论的探讨,丰富了武术本质论的认知,但学界对武术本质的认识尚未形成共识。正确地认知、理解和把握中国武术本质对指导中国武术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要实现中国武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武术融入体育强国建设之中,其根本问题在于从理论上厘清、剖析并建构正确的中国武术本质论。研究以马克思主义整体论为指导,采用文献资料法、逻辑法等,将武术技击与武德视为有机整体,研讨并建构中国武术本质论,以期摆脱武术现有的“唯技击论”等偏于一隅的本质论桎梏,为中国武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融入体育强国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收稿日期:2025-03-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1BTY108)。

作者简介:李 龙,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武术文化哲学。

1 技击：中国武术亘古不变的显性本质

谈到武术技击本质，绕不过2017年的“徐晓冬事件”和2020年的“马保国事件”。这两起事件经过相关平台的传播与炒作，引发社会各界对传统武术能不能“打”的深度质疑，进而引发社会对武术本质问题的激烈争论。争论的外在表征是人们质疑当代中国武术的技击本质，而内在根源则是人们对本国武术本质缺乏统一而正确的认知，继而开始怀疑传统武术时代在场的必要性，甚至出现否定中国武术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究其根本，这两起事件引发争议的关键均在于对传统武术技击本质的僵化理解、对传统武术的逻辑认知不清晰，缺乏对中国武术技击本质及其与现代搏击之间关系的正确认知和把握。

在古代冷兵器时代，武术与军事武艺交融，技击是武术的主要表现形态。《夜行宗谱》曰：“所谓技击，乃以武艺行实战搏杀之能。”^[10]因而，古代军事训练十分注重武术的技击训练，将武术技击作为军事训练的重要内容。明代戚继光强调，武艺是一种“贴骨的勾当”，这种“贴骨的勾当”的价值功能在于“当兵防身立功杀贼救命”^[11]。他要求学习武艺，“务要俱照示学习实敌本事”^[11]“既得艺，必试敌”^[11]，反对“学花枪”“支虚架”等“以图人前美观”但脱离武艺技击本质的“花架子”。清初武术名家吴殳在《手臂录》开篇中也简明扼要地指出武艺在军事中的重要作用：“枪为诸器之王，以诸器遇枪立败也。”^[12]

近代是冷热兵器交叉的时代，武术的技击属性依然有用武之地。孙中山曾认为，中国固有之“技击术与枪炮飞机有同等作用亦奚不可”。张之江认为，战场上“冲锋格斗，杀敌致果，国术尤能独操胜算”。^[13]他曾在《敬劝同胞速练国术备纾国难书》一文中论述：“或谓今日者，科学战争是尚，疑国术无甚裨益……最后胜负，恒决于白刃格斗……每次最后胜利，十之八九，多得力于有国术技能之部队。”^[14]又在《中央国术馆七周(年)感言》^[15]中进一步阐述技击在战场上无可替代的作用。近代中央国术馆和精武体育会均注重武术技击传习，如中央国术馆1928年和1933年举办的两次国术考试，均设有技击项目。

现代武术作为一项体育项目，虽与军事脱离，但

技击仍是武术本质的价值认识图景。现行武术教材和武术专业书籍中均将武术视为技击术，如“寓技击于体育之中”“以技击动作为主要内容”，由此可见，技击是武术的本质这一认知得到学界和武术界的广泛认同。原福建省武术队总教练曾乃梁强调，“既然是武术，攻防就是少不了的。”^[16]国家武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培锟先生在其创编并出版的《心剑》中同样坚持“剑术技击术是‘心剑’的核心，求准确、达位、显达”^[17]的观点。脱胎于军事武艺的武术，在现代文明法治社会环境中，尽管披上了一层体育的外衣，成为一种“具备技术性、战术性以及思考性的文明对抗方式”^[18]，但依然保持着“传统武术技击”的本质。不可否认的是，武术的技击本质正在不断弱化。

要全面认识中国武术的显性本质——技击，需要正确地区分中国武术技击的客观性和主观性问题。武术技击的客观性是武术技击的技术性存在，不同武术技击的客观性，既存在共性，又具有个性。武术技击的主观性是和习武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习武者对武术技击技术的主观选择与运用。因而，不同的习武者对客观的武术技击技术的理解和运用存在个体主观性差异，尤其在两两相当的实战对抗当中如何根据对手变化合理使用技击技术更具主观性。就武术技击的客观性和主观性而言，任何人如果想简单地通过习武者个体的格斗输赢去判断武技的优劣，未免有失偏颇。习武者个体的格斗输赢只能证明当事双方运用武术技法的能力水平高低。因而，仅通过两起“约架”事件的失利即否定中国武术技击的做法毫无意义。且在同一格斗场中试图去通过个体输赢而判断项目的优劣，则是一个毫无逻辑的伪命题，如在拳击比赛中，运动双方的输赢只能判断其运用技法的能力高低，而无法判断拳击项目的优劣与否。

同样地，不同技击项目之间通过运动员比赛输赢判断项目优劣也是一个伪命题。但是在现实中，尤其是商业比赛中多有人热衷此伪命题，其似乎合理性的逻辑在于，在技击的客观性和主观性统一中巧妙地用技击的主观性悄悄地混淆了技击的客观性。由于技击的主观性和技击的客观性都是通过运动员表现的技击形态来展现的，进而两者在现实形态中具有统一性。再加上比赛举办方通过各种宣传

和商业炒作,有意无意地将技击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混淆在一起,由此导致缺乏技击专业性知识的多数观众根本无意识去辨识技击的主观性和客观性,更谈不上对这一现实问题展开理性的正确认知。于是通过不同格斗项目比赛判断项目优劣的伪命题变成了现实命题。这就是不同项目之间通过个体对抗比较项目优劣背后的理性狡计。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格斗项目之间无法举办比赛,举办健康的合规合法性比赛,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和谐发展。需要反对的是,企图通过比赛输赢评判项目优劣,继而糊弄观众、贬低甚至否定或过誉于一种武技,混淆社会认知的格斗比赛。

当前,中国武术存在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两大形态。传统武术是以门派或拳种为基本要素形成的中国武术形态。竞技武术主要以竞技武术套路和竞技散打等两种武术形态开展。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由于价值指向不同、训练体系不同,对中国武术技击本质的表达具有差异性。要正确地理解和把握当前中国武术发展形态,就要对中国武术技击性进行解剖,因为技击性是中国武术的显性本质,中国武术发展形态不能与之背离。

“能打”是人们对武术技击性的最朴素认知,那么,如何认识中国武术的技击本质是关系中国武术发展的一个关键问题。毫无疑问,“技击的本质是暴力,技击水平的高低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武术暴力性的强弱。”^[19]但是,止戈为武,中国武术的“基本精神却是泛和谐的和平主义,而不是强加于人的侵略主义,特别不屑于血淋淋的暴力宣泄。”^[20]因而,仅从“能打”与“不能打”的二分法角度看待和理解武术有失偏颇,“打”是一种技击技术,“不打”是一种技艺境界,从“打”到“不打”体现了武术从务实到务虚、从野蛮到文明的发展转变^[21]。因此,对中国武术技击本质的认知、理解和把握,应该采取一分为多的方法去认知、理解和把握。冷兵器时代,武术的技击本质主导的武术出场形态确实是“能打”,这和当时的社会语境需求有着密切的关联。事实证明,武术发展迄今,武术的技击属性还包含着技击“能打”之外的技击形态,如“武术套路习练时为了培养技击之意,经常将假想之敌贯穿到招式动作的攻防之中”^[22]。可见,随着时代变迁,武术出现了多元化技击的表现形态。

结合当前中国武术的发展形态,研究认为,中国武术技击性并不是仅有的一种显现形态,而应具有3种显现形态,分别是:实战技击、相对实战技击、想象技击。所谓“实战技击”是指格斗双方完全不受格斗规则约束的技击,“相对实战技击”是指双方在一定格斗规则约束下的技击,“想象技击”是指以表现动作攻防含义为主的意象性技击。所以,理解和谈论武术的技击属性的前提是要明晰话题所指的武术技击是指哪个层面的技击。否则,对武术技击属性的认知必然是片面的,而沿着这一片面性认知去理解武术套路,也就不难理解中国武术套路为何遭遇技击非议了。因为用“实战技击”或“相对实战技击”去衡量武术套路的“想象技击”,就是衡量标杆的误用,导致误读在所难免。因此,对中国武术技击本质既要做正确的分层理解,又要做整体观理解。中国武术无论是“想象技击”也好,还是“实战技击”或“相对实战技击”也罢,都不能抛弃技击属性,否则就会失去其作为武技的本真意义。

当今竞技武术套路发展之所以饱受争议,恰恰是因为丢失了中国武术的技击本质。“高、难、美、新”是竞技武术套路契合奥林匹克精神,确立的技术发展主导方向,其目的是让中国武术登上奥林匹克运动舞台。质言之,当今竞技武术套路的目的在于推动中华民族文化繁荣和发展,同时,对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那么,贯彻这一技术发展方向的关键就在于,不管竞技武术套路如何理解和展现“高、难、美、新”,竞技武术套路技术发展都需要符合武术技击本质,竞技武术套路技术发展都需要符合国家和时代的需要,这是当今竞技武术套路技术发展必须坚守的方向。

竞技武术套路技术发展方向的“高、难、美、新”,应该以“想象技击”为轴心展开。中国人在艺术上喜欢写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也嵌于武术套路之中。武术套路是一种写意的想象技击术,“练时无人似有人”的“想象技击”是武术套路演练的主要特质。如今,竞技武术套路受到非议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想象技击”本应是竞技武术套路的显性本质和基础,却在竞技武术套路“花法化”发展过程中被其遗忘甚至抛弃了。由此可见,竞技武术套路技术发展方向的“高”应在于体现“想象技击”之

“高”“难”应在于体现“想象技击”之“难”“美”应在于彰显“想象技击”之“美”“新”应在于表现“想象技击”之“新”。竞技武术套路技术的“高、难、美、新”所内蕴和彰显的“想象技击”既要来源于技击的现实，又要高于技击的现实。在技击上，“逼真但不真实”应该是竞技武术套路技术发展方向始终要坚守的不二法门。

在竞技武术套路技术发展“高、难、美、新”的具体动作编排上，2021年12月，国家武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专家王培锟先生创编并出版的《心剑》，对破解竞技武术套路技术如何展现“高、难、美、新”问题，具有引领和借鉴价值。《心剑》在聚焦“新”的方向上，创建了手中无剑，但是在技术演练中，又让人感觉到如剑在手，做到了“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演练中，王培锟劲力通达，招招式式寓含技击，准确到位，通过逼真的“想象技击”，将自身置于战斗的环境气氛，展示出酣畅淋漓的技击场景，充分展现了“以心驭剑”之境。《心剑》“新”在聚焦逼真的“想象技击”，通过演练叙述一段精妙的技击故事，这种技击之“新”，是一种不同于影视武打的“艺术技击”。王培锟认为，“剑术技击术是‘心剑’的核心，求准确、达位、显力”^[17]。《心剑》一书的出版对竞技武术套路如何展现“高、难、美、新”具有理论和实践的指向性价值。

质而言之，就中国武术技击的显现形态而言，传统武术讲究的是“一招制敌”的“实战技击”。竞技武术套路是一种“想象技击”，散打则是一种“相对实战技击”。“想象技击”要转化为“相对实战技击”，需要进一步修正训练方式和方法。在竞技武术中，竞技武术套路尽管在客观上具有技击性，但是由于训练手段和方法的不同，这种技击性只能是一种“想象技击”，并不能等同于“实战技击”或“相对实战技击”。因而那些试图将现代搏击与竞技武术套路进行比较的做法，即将“想象”与“实践”进行比较，是一种非客观的错位比较方式，不具备任何比较意义。散打属于技击范畴，它和其他搏击运动具有共性要素的同时，又具有个性要素，因而它们在一定规则下可以同场竞技。

2 武德：中国武术发展的“伦理罗盘”

世界上不论哪个民族、哪个国家，其武技都具有

技击性，技击性也是中国武术本质的必要条件。因此，仅仅从技击维度很难区分中国武术和世界其他武技的区别。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武术本质并不完全在于技击？或者说，技击只是中国武术本质的一面，中国武术本质还有另一面呢？研究认为，中国武术本质的另一面是“武德”。

中国武术的技击本质决定武术具有暴力基因。如何规训和教化武术技击，就成为一个伴随着武术发展过程而不得不破解的根本问题。纵观武术发展历史进程，脱胎于军事武艺的传统武术与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华传统文化相濡化，逐渐脱离了最初“杀人技”的单一范畴，在儒释道哲学思想文化“熏陶”与“浸染”下，逐渐积淀出规约武术技击使用的隐形本质——武德。它蕴含着中国特有的伦理文化意蕴，是中国伦理文化在武术中的集中体现。就世界文化而言，武德是在中国这片特有的地理空间中形成的武术伦理文化。武德既源自并成长于中国儒家伦理文化等传统文化之中，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它融摄于中国武术技击之中，是支配中国武术发展的伦理罗盘。

“武德是练武人的救命草，没武德伤害他人是一方面，更糟糕的是，会把自己弄得家破人亡。”^[23]因此，武术历来讲究“未曾学艺先识礼，未曾习武先明德”^[24]。武德不但是习武者修炼、运用技术的伦理罗盘，而且是习武者为人处世、立足社会的伦理罗盘。“武德之生成，随动作行道之途径，伴动作技能自动化之过程，而将外在的武德规范内化为主体的‘自我技术’”^[25]。武德以一种“理性狡计”的存在方式隐匿并支配习武者的技击全过程，促进习武者技艺与品德的内外双修。究其运作机理，大概是习武者通过对技术的千锤百炼，“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把技术内含的技理技法和武德伦理有机结合升华为一种“武术知识”，然后，通过武术修炼过程的规训和教化，把“武术知识”变成“武术共识”，进而把“武术共识”变成“武术文化常识”，长期浸润并成为习武者一种日用而不觉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最终把这种常识理性内化为习武者共同遵守的戒律规约——武德，约束习武者的行为规范和言谈举止。就价值论而言，武德不仅戒约了习武者的日常行为规范，而且指导习武者的精神世界发展。换言之，武德是衡量习武者修身处世的价值尺度。周

伟良^[26]认为，“武德伦理规范、习武中的意志品质和体现为‘内圣外王’的侠义精神”，共同组成了一张内在具有多重结构且反映广大习武群落道德伦理的武德内容之网。王培生^[27]强调，“练武者应遵守武德……方可德艺兼修……否则必入歧途。”由此可见，武德对习武者的约束是全面的、多维度的，既包括习武场域的言谈举止和行为规范，又包括习武者传习武术过程中的言谈举止和行为规范，还包括习武者的日常生活言谈举止和行为规范。所以，武德是习武者运用中国武术技击的“伦理罗盘”，是武术界共同信仰的一种言行准则，是形成武术界共同体的隐性始基。其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习武之德、授武之德、用武之德和生活处世之德。

武德既是习武者独特的生存智慧、伦理价值理念和武术文化精神标识，又是中国武术发展的伦理罗盘，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对传授武术的规范。李仲轩曾言：“武术的传承是不讲情面的……练武是‘孝’字为先，连自己父母都不孝顺的人，没人会教他。”^[23]中国武术尤其传统武术注重师徒传承，这种传承既有对师父的考察，也有对徒弟的考量。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这是对师父的要求。师父不但对徒弟的武技负责，还要对徒弟的道德品行负责。“这种言传身教的传承方式既注重徒弟的武术技术传承，又注重徒弟武德的规训和教化，将武德教育渗透于师徒传承的全过程。”^[28]对徒弟也有要求，中国武术各门派都有自己的一套武德伦理规范，约束门派武技的传承。如“武当派有五不传：即骨柔质钝者不传，心险者不传，好斗者不传，狂酒者不传，轻露者不传。”^[24]峨眉武术强调，“不知者不与言，不仁者不与传。谈元授道，贵乎择人。”^[24]

第二，武技之外，对习武者日常生活、工作等行为的教导。无论是徒弟还是师父，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工作中，都要用武德伦理约束自身言行，体现习武者的武德讲究。如武术各门派都要求尊师重道，日常对待师长，要敬谨将事，不要有违抗及傲慢之行为等。

第三，对习武者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精神塑造。习武者通过数年如一日的苦练，把武德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强意志品质、诚实守信的做人品格等武术文化精神融入习武者的“血

脉”之中，内化于心，进而使习武者具有不同于非习武者的品格。其在国家或者民族危难关头，都能勇于直面困难，挺身而出，报效国家，诚如司马迁所言：“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身躯，赴士之危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29]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就“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及学校课程思政教育问题曾做出高屋建瓴的指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之一，中国武术应该走进校园，责无旁贷地担当起这一使命。在目前体育教育中，校园体育教育内容主要以田径、篮球、足球等运动项目为主。武术作为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代表，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只有通过中华民族文化的教育才能实现。这应是武术进校园的目的和价值之所在。因此，在学校教育这块阵地上，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把武德教育作为武术学科“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有效抓手和手段，将武术从现有的体育教育内容中剥离出来，独立开设每周一节武术课和结合校情因地制宜的开展多元化的武术文化活动，大力发展武术教育，使广大青少年接受武术文化熏陶，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这就需要广大武术教育工作者勇于担当、善于作为，扛起这个伟大而光荣的使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入武德教育之中，建构起新的社会主义武德观，谋划和实施中国武术教育，写好对青少年武术爱好者和习武者进行思政教育的这篇大文章。

3 “德击”一体：中国武术不可分割的本质论

世界上内蕴技击的武技很多，如跆拳道、泰拳、巴西柔术等。“仅从技击角度而言，世界各国的武技‘大同小异’，它们是‘同质异趣’的东西。”^[30]“散打、拳击、跆拳道、摔跤、泰拳、自由搏击等都是人体格斗类的项目，凡是同性质的同类体育项目，在技术上肯定会有一些相同之处，这是人体运动规律所决定的。”^[31]可见，如果将中国武术本质全部归结于技击，就可以发现技击不是中国武术独有的专利。因而仅从技击的单一维度，很难分辨中国武术与世界其他武技的根本区别。

曾于久^[32]认为，“世界各国的武技具有相同的本质——技击，具有不同的特色——文化上的差别。”因此，研究认为，游走在武技之内的文化要素不同，是世界各种武技差别的本质所在。文化的地

域性塑造了文化的差异性,武德是在儒家伦理文化熏陶下形成的,一方面对武术技击进行全方位、全过程规训、教化,一方面“贯穿师父管理徒弟、武术改造人的整个历程”^[33],由此决定其是中国武术特有的区别于世界其他武技的文化标识要素。也就是说,中国武术将普适性的技击与独特性的武德融为一体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是其区别于世界其他武技的重要标识。就中国武术本质而言,武德和技击是其一体两面,离开武德谈技击,或者抛弃技击论武德,都没有任何实质性意义。中国武术是一种以武德和技击为一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存在,武德以一种“隐”的方式游走于技击之中,武德为其隐性本质,技击则是其显性本质。

既然武德和技击融为一体是中国武术区别于世界其他武技的重要标识,那么对中国武术而言,区别自身不同拳种门派(或者流派)的标准又是什么呢?研究认为,中国武术与世界其他武技的区别和中国武术自身门派(或者流派)之间的区分,源于它们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前者属于中华民族文化和世界其他民族文化的差异性问题,后者属于中国武术文化自身内部存在的差异性问题。中国武术门派(或者流派)的差异性问题本质是中国武术文化多元化形成的问题。至于中国武术文化多元化的形成要素,《传统武术文化多元化的地域文化阐释》一书认为,主要有6个方面要素,即地理环境的地域性差异、地域分化的民俗遗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差异、“成家立业”文化观念、社会制度和政治背景和差异化理解等^[34]。

既然中国武术的武德和技击是一个有机体,那么其理论基础是什么、中国武术本质整体形态又是什么呢?《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35]阴阳学说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思想,是农耕社会以来人们辩证地认识和理解世间万物的根本世界观和方法论之一。在日常生活中,它已经成为一种日用而不觉的“理性狡计”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进而积淀为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标识。武术是人们的社会实践方式之一,因而阴阳学说对武术的文化濡化是不言而喻的。如“柔中寓刚,绵里藏针”的太极拳理精髓和“一阴一阳之谓拳”的拳理要义,足以表明阴阳学说深刻影响着中国武术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在阴

阳学说的濡化下,中国武术本质具有阴阳两面。人们对武术本质认知应从阴阳两面一体的角度去整体性把握和理解,才能正确地理解当代中国武术的功能来源和现实形态,而不可偏颇对待任何一方,更不可废弃任何一方,否则都会走入“盲人摸象”的泥淖。

通过上述对技击和武德的关系解析,研究认为技击和武德是中国武术本质的阳和阴,现实显现形态是一体两面,一体即中国武术,两面即技击(阳)和武德(阴)。它们相互依存,互为存在的条件,相互扶持,相互成就。武德内蕴的中国伦理文化意蕴对中国武术技击性具有支配和规训作用,同时经过武德支配和规训后的中国武术技击性又会用这种内化形成的武术技理去反哺武德。正是通过这一运行机制,中国武术的武德和技击性有机地融为一体。武德不离技击,技击不离武德,技击和武德互为其根,须臾不可分离,正所谓“孤阴不生,孤阳不长”^[36]。否则中国武术就不能称之为武术。就中国武术而言,既不存在没有内在武德约束的技击,也不存在没有外在技击载体的武德,任何试图割裂技击和武德去谈中国武术都是一种伪命题。只有将技击和武德融合、贯通起来,合二为一,作为一个不可分割地有机整体看待,才能全面准确把握中国武术“德击一体”的本质要义和其作为区别于世界其他武技标尺的重大意义。

另外,中国武术“德击”一体的本质具有历史性,是浸润在漫长的不同时代的历史长河中形成的。不同时代的出场语境差异,决定了中国武术武德、技击一体的本质形态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其内涵和外延既有历史时间纵向的继承性,又有历史空间横向的吸收性。因此,要关注并把握中国武术武德、技击一体的本质论在不同时代的出场语境差异,行走在差异的融合之中,开展中国武术本质的古今对话,解构武术本质,在变与不变的时代意蕴统一中维持中国武术的时代在场性,切忌教条式的理解武术之本质。

4 结语

中国武术之所以是中国武术,其本质在于中国武术是一种武德、技击一体的武技。须臾不可分离的武德和技击的有机融合,是中国武术的始基和活

的灵魂。中国武术的发展要系统、整体、有机地聚焦、理解和把握中国武术武德、技击一体的本质,任何试图将技击和武德分而论之,并用其指导和谋划中国武术未来之发展都必将使中国武术的发展走上歧路。

竞技武术套路的现代发展之所以受到非议,其原因就在于没有正确地把握、理解中国武术本质,甚至脱离中国武术本质,尤其是中国武术技击的本质——想象技击的缺失。由于训练手段等诸多因素,竞技武术套路虽然不能彰显中国武术之能打,但是它毕竟还是一种以技击的动作元素为始基的武术文化。代代传承下来的精巧的技击含义、技击神韵是竞技武术套路“金字塔”尖上需要继续保留的东西。只有聚焦于此,去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竞技武术套路技术的“高、难、美、新”,才能阐释好中国武术文化理念,继承和弘扬中国武术文化,进而讲好中国故事。

新时代,要正确认知、深刻理解和全面系统把握中国武术“德击”一体的本质,引领中国武术融入体育强国建设和健康中国建设之中,布展中国武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基本格局,进而助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刘文武,朱娜娜,闫民.“项目化”武术的利弊分析与大武术观的提出[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3,32(1): 133-135.
- [3] 杨建营.对“技击是武术本质”的深化研究[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44(11): 66-69.
- [4] 洪浩,杜纪锋.论武术本质的层次性[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6(6): 95-97.
- [5] 侯胜川,赵子建.解读与超越——对中国武术技击的再讨论[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9,42(2): 147-156.
- [6] 田展玮,侯胜川.技击还是攻防:论中国武术的本质及其影响[J].体育学研究,2023,37(6): 91-98,109.
- [7] 陈青.武术本质的立体探析[J].中国体育科技,2022,58(7): 107-113.
- [8] 张峰.武术本质的文化审视[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0,33(8): 142-144.
- [9] 吴福友,付文生,席饼嗣.从生命哲学探讨武术的本质与发
- 展策略[J].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08,32(5): 57-60.
- [10] 张雷.对武术“技击”概念的解读[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20,37(2): 213-217.
- [11] 戚继光.纪效新书[M].马明达,点校.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 [12] 吴殳.手臂录[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 [13] 张之江先生国术言论集[M].南京:中央国术馆,1931.
- [14] 张之江.敬劝同胞速练国术备纾国难书[J].国术周刊(南京),1932.
- [15] 张之江.中央国术馆七周(年)纪念感言[J].国术周刊(天津),1935.
- [16] 余功保.盈虚有象[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 [17] 王培锟.心剑[M].香港:香港国际武术总会有限公司,2021.
- [18] 彭国强.中华传统武术技击的争鸣反思,价值提炼与能力提升进路[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47(7): 87-94.
- [19] 蔡峰,张建华,张健.暴力的规训:从传统武术技击到现代散打运动[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7,36(3): 139-144.
- [20] 阮纪正.至武为文:中国传统武术文化论稿[M].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
- [21] 李源,梁勤超,姜南.“打”与“不打”:武术形象的二元认知[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8,41(7): 126-132.
- [22] 陈新萌.形塑与归因:中国武术“意会”文化阐释[J].体育学研究,2019,2(2): 42.
- [23] 李仲轩,徐浩峰.逝去的武林-1934年的求武纪事[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 [24] 全国体育院校教材委员会审定.武术理论基础[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
- [25] 戴国斌,刘祖辉,周延.“炼行道,练以成人”:中国求道传统的武术文化实践[J].体育科学,2020,40(2): 24-31.
- [26] 周伟良.行健放歌——传统武术训练理论的文化诠释[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
- [27] 刘俊骥.武术文化与修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 [28] 李龙,李伟.武术修炼四境界[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4,38(4): 85-88.
- [29] 汪涌豪.中国游侠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 [30] 温力.中国武术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5.
- [31] 曾于久,陈星.武术散打运动30年的回顾与展望[J].武术科学,2009,29(6): 8.
- [32] 曾于久.武术本质论[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9,43(11): 5-12.
- [33] 杨国珍,段丽梅.“发而皆中节”:武术功夫的主体生成及启示[J].体育学研究,2022,36(6): 113.
- [34] 李龙.传统武术文化多元化的地域文化阐释[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20.
- [35] 老子.道德经[M].黄朴民,译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 [36] 程允升.幼学琼林[M].张慧楠,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

Ontological Study of the Integration of Virtue and Combat in Chinese Wushu

LI Long

(Development Planning Office Nanjing Sport Institute, Nanjing 210014, China)

Abstract: A dialect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Wushu, especially competitive Wushu routines, requires a comprehensive and holis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ce of Chinese Wushu. Using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essence of Wushu, aiming to provide essential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understanding, interpreting, and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First, Wushu combat comes in diverse forms. Wushu combat can be divided into imaginary combat and relative combat, and actual combat.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high, difficult, beautiful, and new" of competitive Wushu routines should be adhered to and centered around the meaning, delicacy and virtue of Wushu combat handed down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Second, Wushu virtue serves as the ethical compas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and plays a governing and disciplining role. Third, the essence of Chinese Wushu lies in the integration of Wushu virtue and combat. Virtue and combat are two inseparable dimensions of Chinese Wushu, mutually rooted, interdependent, reciprocally supportive and reinforcing. There is neither combat that exists alone without the constraints of internal Wushu virtue, nor Wushu virtue that uses no external combat as a carrier. It is a false proposition to talk about the essence of Chinese Wushu by separating combat and Wushu virtue. Only by treating combat and Wushu virtue as an organic whole can we correctly view and understand Wushu, and then guide the development of Wushu.

Key words: essence of Wushu; Wushu virtue; imaginary combat; relative combat; actual combat; competitive Wushu routines

(上接第60页)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AI-Driv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in Sports Enterprises

ZHOU Jiaqi, REN Bo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Sport,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as an important driving engin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s profoundly changing the production process,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service mode of sports industry,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sports enterprises. In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change, how to grasp the technological opportunities and build an intelligent development path suitable for the modernization need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for the academia and the industry. Based on the TO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e study explores the multiple paths through which AI drives the enhanc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sports enterprises from a configurational perspective, using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as the method and 29 listed enterprises in the field of sports intelligence in China from 2022 to 2024 as the sampl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are three core configurational pathways for AI-driv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in sports enterprises: ① policy support-R&D path; ② policy leverage-public response path; ③ ecological synergy-resource integration path. The study breaks through the paradigm of single-factor analysis and reveals the complex causal mechanism of AI technology empowering sports enterprises from a configurational perspective, which provides theoretical insight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sports industry subjects to identify the key element combinations and buil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the mids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ports enterprise; TOE theory;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enterprise; configuration path